

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理解，则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整体情况的思考。”^①这种研究转向对增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自觉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国外学者更加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重视对中国发展奇迹与社会主义理论相互关系的研究，重视对中国共产党建设与中国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重视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相互关系的研究，等等。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触及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比较问题，触及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问题，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注重点。这种“中”与“外”的互动，不仅可以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且可以促进国际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在这种理论互动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洋为中用”的方法论原则。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及其不断扩大的世界性影响将不断改变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的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上的具体体现。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和创新趋势

刘书林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1984年应运而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2005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被列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成为其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40多年来，在党的带领下劈风斩浪，展示了自己的风采。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天独厚、迅速发展、茁壮成长，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① [法] 让-克洛德·德洛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赵超译，王新颖主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

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清醒的理论自觉、科学的理论思维，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新时代的迅速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全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迅速发展，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取得发展的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① 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发展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全面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办学立德树人的政治方向。党的领导还体现在坚持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为党的教育事业保持正确政治方向提供了组织保证。党的领导还体现在长期稳定保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个主旋律连续出现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维护了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稳定局面。党的领导还体现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上。在党的领导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坚持德育第一、又红又专，各校大多制定了富有特色的校训、校歌，形成了健康向上的校风。

第二，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学校干部和教师队伍建设中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提高了干部和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一个时期以来，在国内外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下，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被淡化，造成一定的消极后果。党的十八大之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② 显然，这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覆盖了全体师生员工。

第三，进一步明确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②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地位和功能,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系统全面地擘画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守正创新的蓝图。一是表达了党中央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高度重视。^①二是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要求: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做让学生喜爱的人”。^②三是指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辩证地处理学术研究和业务工作中的八个方面的辩证关系,^③从八个方面解开了大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困惑。四是督促各级党委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④

第四,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激发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生机活力。“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⑤然而,一个时期以来,理想信念的缺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⑥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⑦大学教材里讲理想,一度只提社会主义、不提共产主义;《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因其歌词第一句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⑧有时竟不便演唱。

针对这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⑨在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教育引导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⑩

①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9页。

②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30页。

③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30~331页。

④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31页。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⑥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⑦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页。

⑧ 参见刘习良主编:《歌声中的20世纪:百年中国歌曲精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386页。

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

⑩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民日报》2018年9月11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突出抓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激发了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有生力量，带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群众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之呈现崭新局面。

第五，以持续斗争的战略对待国内外错误思潮的渗透和侵袭，建设学术重镇，培养学术骨干，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近几十年来，人们对社会思潮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我国从“十五”计划开始就把引领社会思潮纳入国家五年计划。但是，党的十八大前，一些错误思潮不断以节奏型的活动方式卷土重来。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对错误思潮持续进行旗帜鲜明的批驳反对，使错误思潮得到有力遏制。我国对待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的战略就是这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这是前车之鉴啊！”^①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许多同志投入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显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威力。

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坚决回击了西方散布的“普世价值”思潮、西方宪政思潮、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西方新闻自由思潮。通过反对错误思潮，净化了意识形态环境，分清了理论上的是非，壮大了队伍，培养了学术骨干。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新时代初步形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和标志性意义的学术生长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号召、指导和鼓励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业人员积极响应，进行了许多科研探索和极有意义的深刻思考，为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奠定了基础。现以个人之见陈述如下。

第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原创性标志性学术生长点。在学科诞生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3页。

之初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按照列宁在《怎么办?》中的论说,确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灌输”。这本无可非议,但是,随着西方思潮的涌进和情况的变化,有些学者或明或暗地想取消“灌输”的说法。

党的十八大之后的氛围使“灌输论”的本质表述得到了延续和发展。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①这显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要求,即完成“灌输”的本质任务,并与调动客体主观能动性的启发式方法结合起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干教材《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及时落实了这一指示,做出了新版的修订。^②

近年来,国内道德教育界有观点认为,一些人对“灌输”这个概念的排斥仅仅是西方教育学部分观点的“理论旅行”,以国外某一特定时期的观点作为反对“灌输”的依据,忽视其教育史上灌输事实的完整性、复杂性和隐蔽性,源于人们对过去德育中绝对主义、权力主义的一种矫枉过正的理想冲动。^③这一研究的新进展提供了坚持“灌输论”的新条件。

第二,探索中华文明在历史上长期领先发展与近代文明蒙尘现象的内在规律。这是关系到科学理解在资本主义阶段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何较早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走在世界文明前列的问题,同时也是广大干部、群众长期以来在思想理论上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外历史研究的展开,我国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开始撬开这一难题的若干环节。现在,已经完成的研究有以下方面:其一,中华文明的确曾在人类历史上长期领先发展;其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较早并延续至今没有断流;其三,哲学界和历史学界已经关注到,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国家或地区都是原有社会形态比较落后的地区;其四,马克思在《资本论》等文献中使用的社会“外壳”论,已经被用来分析社会形态运动的具体规律;其五,列宁的“薄弱环节”论已经由苏俄和苏联历史证明;其六,毛泽东提出“空气稀薄地区”论,^④着眼点在资产阶级文化影响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31页。

② 参见《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编写组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25年版,第82页。

③ 参见班建武:《道德灌输的本体论意义及当代危机》,《思想教育研究》2006年第9期,第60~63页。

④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7页。

的久远；其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已经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能够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实现民族复兴，并为世界作出较大贡献。^①

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是：其一，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华文明在历史上领先与蒙尘之间的关系；其二，将近代中国由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转向主动的具体原因揭示清楚；其三，将对中华文明曲折发展的脉络的分析向世界历史延伸，扩大眼界；其四，利用唯物史观和全球历史潮流中的新发现、新证据，完成对中华文明在历史上领先和蒙尘现象的内在规律的全面概括。关于上述问题的部分研究成果已经陆续发表并引起关注。^②

第三，应抓紧填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研究的缺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对象是两部分人：青年和党政干部。从历史上看，学界对青年群体的系统研究比较多。我们在青年研究中对80后、90后较熟悉。但是，当有人在学术会议上发问“00后青年怎么样”时，在场的研究者无人应答。可见，关于青年思想特点和状况的研究存在缺位。其实，00后青年并非“躺平”一词能够概括的，大部分青年在新时代展现了令人兴奋的积极因素，这方面的研究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极为有利，因此，这方面研究的缺位应该填补。^③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党的自我革命创新理论相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年秋至翌年5月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需要同时进行两种革命，即夺取政权的革命和清洗掉自身从旧社会带来的陈旧思想意识的革命，这样才会获得最终的成功。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相契合。^④

第五，关于文明互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创新型表述。其一，“自主限关”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20页。

② 参见刘书林：《新时代中华文明魅力的新展示与“两个结合”研究的新境界》，《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7期，第1~13页。

③ 参见刘书林：《新世纪以来青年价值观新取向分析》，《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9期，第10~16、106页。

④ 参见刘书林：《党的自我革命与思想理论建设》，《文化软实力》2022年第4期，第31~35页。

的表述具有创新性。在表述明清时期中国外事活动状态时，学界一般使用的词语是“闭关锁国”“封闭半封闭”。但在主权不属于腐朽性质时，对政府对外来入侵采取的自卫和对抗性的闭关，不宜用“闭关锁国”或“封闭半封闭”来表述，使用“自主限关”来表述比较得当。^① 这涉及对待民族主体性的态度问题。

其二，在19世纪时，欧美学者曾著文证实，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为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典范，欧美文官制度系从中国借鉴而来。科举考试中的“平等考试”环节，堵塞了封建官僚霸占官场权力的渠道，具有历史进步意义。^② 尽管中国的科举制度于1905年被彻底废除，但这种换位思考的研究具有“文明互鉴”的积极意义。

上述例子说明跨学科、跨国界的文化文明研究极有价值、值得重视。

新时代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前瞻^{*}

吴学琴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自2008年正式设立以来，始终以“史论结合”为方法论特色，以论证“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为核心使命。新时代以来，学界围绕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的主体性和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概念与方法路径等关键领域展开了积极探索，取得明显进展，为学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 参见朱昌荣：《新时代清史研究刍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1期，第78页。

② 参见李丽萍：《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与科举制对其影响的进程》，《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104~105页。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人才项目“21世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话语创新研究”（22VRC094）、安徽省高校创新团队项目（2022AH010008）的阶段性成果。